

台灣總督府日本漢文人的滿韓行旅 及其東亞觀（1895-1910）

莊怡文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摘要

日本「國家主義」（Nationalism）發展始於明治維新，經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日本漢文人的中國觀與東亞觀產生巨大轉折，日本漢學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漢文人自小學習中國古典學術文化，不免將「文化中國」作為自己的精神原鄉；漢文人來台後，發現具有「文化中國」符碼的台灣竟成日本殖民地，「現實中國」亦今非昔比，其思想之矛盾更為明顯。自1895年日本領有台灣至1910年正式合併韓半島，這十五年間可謂是形塑近代日本知識分子中國觀與東亞觀的關鍵時刻，關鍵點則是台灣與韓半島。本文以小泉盜泉與關口隆正為例進行觀察，小泉對於滿、韓較具同情眼光，而關口則強調日、韓友誼關係，避開中、日與中、韓文化淵源，兩者都對「現實中國」感到遺憾，「文化中國」與「小中華韓半島」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中國結」。

關鍵詞：日本漢文人、日本漢學、文化中國、小泉盜泉、關口隆正

The Manchu and Korean Peninsula Tours of Japanese Sinologists from the Office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 and Their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 (1895-1910)

Chuang Yi-Wen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Japanese Nationalism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Japanese sinologists' views of China and East Asia made a huge change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Russo-Japanese War, causing Japanese sinologists to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Japanese sinologists who studie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ince childhood were inclined to regard the "cultural China" as their "spiritual hometown". However, they realized that Taiwan with the "cultural China" code had become a Japanese colony after they came to Taiwan. The "real China" is not what it used to be any more.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ir thoughts was very manifest.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1895 to the official merger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1910, it was the crucial moment for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o reconstruct their views of East Asia and China, in which Taiwan and Korean peninsula played key roles. Taking two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arasen Koizumi (小泉盜泉) and Takamasa Sekiguchi (關口隆正), from the Office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Koizumi was more sympathetic for Manchu/Qing/China and Korean peninsula, while Sekiguchi emphasize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apan and Korean peninsula. Both of them sorrowed for the “real China,” as a result, “cultural China” and “Korean peninsula” became their lingering “Chinese complex.”

Keywords: Japanese Sinologists, Japanese Sinology, Cultural China, Tarasen Koizumi, Takamasa Sekiguchi



台灣總督府日本漢文人的滿韓行旅 及其東亞觀（1895-1910）

一、前言：明治維新後日本漢學與帝國主義的頡頏

日本對於中國文化的慕仿與學習約始於西元七世紀，大化革新（645-654）即為一系列習仿中國唐朝制度與文化的變革運動。在平安時代的前半期，正是由來自中國的漢文學一統天下，後半期國文學興起，內藤湖南認為日本的文化就是在中國文化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¹然而，長時間作為貴族文學的日本漢文學，在明治維新後漸漸失勢，儘管中村敬宇在1883年東京大學設立「古典講習科」的演講時，仍認為「我邦政府重視漢學，造就漢學之人才，維繫漢學之綱常倫理。吾人應知漢學為西洋學之基礎，翊戴明治維新，締造今日之乾坤」；²1877年至1882年旅居日本的黃遵憲，已對當時傳統漢學的衰頹有此觀察：「五經高閣竟如刪，太學諸生守兔園。猶有窮儒衣縫掖，著書掃葉老名山」。³日本政府除了加快腳步學習西方語言與知識外，更欲以日語、國學找回「日本性」，但卻無法擺脫其中根深蒂固的「中國性」。

現代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於1989年寫下舉世聞名的《方法としての中国》⁴一書，解釋了一百年前的這個問題，溝口認為以日本漢學來說，由於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內化為日本式，所以，自江戶以來的中國研究，更多的是「來自他們對於日本文化的興趣或日本的文化傳統」，這就是「沒有中國的中國」。

1 內藤湖南著，劉克申中譯，《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06），頁75。

2 1883年4月16日東京大學設立「古典講習科」乙部之際，中村敬宇的開業演說內容，收於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校注，〈古典講習科乙部開設ニツキ感アリ書シテ生徒ニ示ス〉，加藤周一等編，《學問と知識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十冊）（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8.06），頁199-204。

3 馬歌東，《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01），頁649。

4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06）。後由李甦平等中譯，更名為《日本視野中的中國學》，又名《作為方法的中國》（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09）。

國學」。⁵然而在一百年前日本知識人尚無思考至此，因此容易對於此糾葛且頹頹的「雙重意義帝國主義論述」（子安宣邦認為近代日本的支那哲學論述是同時含有「中華帝國論述」與「日本帝國論述」的「雙重意義帝國主義論述」）⁶產生疑惑，中國／中國性對於日本而言，不僅是「巨大的他者」，更是「無法擺脫的他者」。

明治維新後，「國家主義」（Nationalism）成為日本國民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對內凝聚國民對國家的向心力，對外確立國家主權獨立，然而此國家主義卻默默走上帝國主義路線，美化了日本對於他國的侵略行為。這樣的發展始於明治維新，初立於甲午戰爭，穩固於日俄戰爭，而兩次戰爭皆與中國息息相關，日本知識人的中國觀與東亞觀在這段期間產生巨大的轉折，明治維新後漸走下坡的日本漢學發展，與逐漸高昂的帝國主義思想，呈現截然相反的發展路線。而在新舊年代交替之時，傳統日本漢文人在精神上產生前所未有的革命，社會的變遷也使得其生活面臨巨大考驗，部分漢文人退出政壇、從事講學活動，有的參與或設立漢詩文社團，有些非正式地擔負起日本與中國間關係建立的責任。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本漢文人成為日治初期來台的主要官員。

日本漢文人自小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與思想文化，不免將「文化中國」作為自己的精神原鄉。⁷然而在日本漢文人來到台灣後，發現具有「文化中國」符碼的台灣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其思想之轉折或矛盾更為明顯，比受西方教育的日本知識分子更直接感受到衝擊，此類心情可在日本漢文人如小泉盜泉、中村櫻溪等人之漢詩文作品中窺知。⁸目前學界對於此的研究多著重於「近代

5 溝口雄三著，李魁平等譯，《日本視野中的中國學》（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09），頁91。

6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序〉，《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頁2-3。

7 此精神原鄉之意，指的是日本漢文人面對人生困境時，常會以自小習得的中國古典文學與學術思想作為安身立命的信仰，作為指引人生方向的明燈，作為做人處事的信念。

8 小泉盜泉詩作可見《盜泉詩稿》（東京，1914），中村櫻溪詩文可見《涉濤集》（台北，1903）、《涉濤續集》（台北，1904）、《涉濤三集》（東京，1908）。小泉盜泉相關研究可見胡巨川，〈脫盡恆蹊說盜泉〉（2002）、〈小泉政政及其《盜泉詩稿》析論〉（2003）；謝崇耀，〈小泉盜泉及其漢詩探析〉（2007）；莊怡文，〈小泉盜泉〈漢詩之沿革〉的中國文學觀——兼論其在台傳播之意涵〉（2011）、《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2018）。中村櫻溪相關研究可見廖振富，〈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台灣風土與旅居書寫〉（2008）、〈中村櫻溪北

日本思想的變遷」與「日本漢文人資料之挖掘與詩文賞析」，前者豐碩的成果自不待言，然而後者則正處開發階段，曾行旅台灣或者任職於台灣總督府的日本漢文人受關注程度遠低於當時日本知名漢學者，⁹ 但是其「台灣經驗」更可能影響其中國觀與東亞觀的建構。自1895年日本領有台灣至1910年日本正式合併韓半島這十五年間，日本帝國主義在經過日俄戰爭的勝利後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漲，這段時間可謂是形塑近代日本知識分子中國觀與東亞觀的關鍵時刻，而關鍵點則是台灣與韓半島。尤其在日俄戰爭前後所產生的「滿韓問題」¹⁰，除去諸國際列強在衡量聯盟與對立關係的各自考量，「滿」與「韓」的問題在日本與俄國之間的談判中，幾乎無法取得共識：日本認為「滿洲問題」與「韓國問題」是無法切割的問題，但是俄國認為「滿洲問題」是俄國與中國之間的問題，不是俄國與日本間的談判問題。¹¹ 日人在日俄戰爭勝利後，除了積極經營滿洲一帶的工商、觀光發展，更欲進一步併吞韓半島，在戰爭與侵略政策為上的國際局勢下，來到台灣總督府工作的日本漢文人，如何看待滿韓問題？他們的台灣經驗與滿韓行旅將如何形塑其中國觀與東亞觀？本文擬以以下兩位日本漢文人作為主要討論對象。¹²

台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2009）；莊怡文，〈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2011）；王幼華，〈中村忠誠台灣漢文作品探析〉（2012）；黃敬堯，〈台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台日人中村忠誠研究〉（2012）。

- 9 日治初期來台的日本漢文人多為失意落魄文人，在多數日人眼中，台灣有如未開化之蠻荒地帶，多是在本地事業發展遇到瓶頸者才選擇南赴台灣。誠如島田謹二在日治中後期所提出的「外地文學論」概念，屬於外地文學／殖民地文學的台灣文學，有別於屬於日本中央的內地文學。除非在日本內地時就已成為知名學者，這一群來台日本漢文人日後多半隱沒於文壇，亦少留名青史於日本近現代文學史書寫中。然而這些文人們的台灣書寫與經驗，正是吾人進行台灣文學研究時須重視的部分。
- 10 本論文統一以「滿韓」一詞取代「滿鮮」或「滿朝」之稱呼，原因有二：一是為了不使讀者將其與當今的朝鮮／北韓政權混淆；二是在1910年日本尚未正式全面佔領韓半島時，當時韓半島雖屬朝鮮王朝，但正式國號為「大韓帝國」（1897-1910），《台灣日日新報》之相關報導多以「韓國」、「韓」等詞表示，而在1910年後，《台灣日日新報》上「朝鮮」的使用才驟然增多，由於日本合併韓國後忌諱「國」之詞，因此多以「朝鮮」、「朝鮮半島」稱之。另外，本文盡量以「韓半島」來指稱當今隸屬於北韓與南韓的整體行政區域，避免「朝鮮」或「韓國」等詞所造成的誤解。然而本論文的部分引文因作者背景與書寫年代之差異，論述中仍使用「朝鮮」或「韓國」等詞，為尊重原文，仍以原文呈現。
- 11 井口和起著，河源湖譯，《日俄戰爭的時代》（台北：玉山社，2012.12），頁65-66。
- 12 本文選擇小泉盜泉與關口隆正作為研究對象，除了由於兩位的所處時代、遭遇與行旅滿韓的時間接近外，尚有具有比較意味。當時日本知識人的中國觀與東亞觀是相當多元且正在發展中的，而對於「日本漢文人」這個群體而言，雖有較大比例對於「文化中國」有所依戀，但也有純粹懷有日本帝國主義情緒者，若選擇兩位都相當依戀「文化中國」的文人來探討，可能會使讀者誤以為所有的日本漢文人

小泉盜泉（1867-1908），慶應丁卯11月生於日本奧州盛岡，本名小泉政以，字子潔，號盜泉，父親為小泉寬，有一弟小泉政忠，父親與祖父分別於其四歲與十歲過世。因家中貧困，小學畢業後雖短暫進入過中學，但卻因家庭經濟問題而半途休學。小泉盜泉師事板垣桑陰和山崎鯢山兩位先生，其中山崎鯢山曾受業於幕末漢學家安積退齋、佐藤一齋與梁川星巖。小泉雖學歷不高，但漢學素養深厚，其師板垣桑陰曾讚美他「此孤不賴于師，而步趨於聖蹟，豈鬼神冥助臻于此乎？」，¹³ 神田喜一郎與島田謹二亦誇獎他的才華無人能望其項背，「是一個博學無匹、才氣縱橫、心境高潔而始終帶著一抹禪意的怪人」。¹⁴ 小泉盜泉博學強記，對於東西洋哲學、中國四書五經、佛學等皆精通。其於1900年至1908年間五次來台，曾擔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幕賓秘書等職。1905年後藤新平視察南滿鐵道，小泉盜泉隨行至中國北京、東北、韓半島一帶，將所見所聞撰詩而為《途中雜詩》一卷，收於《盜泉詩稿》。¹⁵

關口隆正（1856.05.25-1926），出生於江戶牛込門內（今新宿一帶），為清水礫洲（1799-1859）四子，本名為「為嶼」（ひとし），又名嶼四郎，其於25歲時被過繼給關口隆吉（1836-1889），後改名關口隆正。其本家清水家具有漢學教育素養，其友館森鴻曾寫道：「土璠少壯師事安井息軒、岡松甕谷，涉經史，善文章，尤長敘事」，¹⁶ 關口隆正亦曾在1884年至1885年間至中

都強烈持有此依戀感。小泉與關口兩位雖皆具有漢學教育背景，然而在個人發展上，小泉盜泉偏文，關口隆正偏武，因此兩位的中國觀與東亞觀有著些許差異，這正是本研究所想凸顯的「同」與「異」，亦是當時日本漢文人群體所展現出的特色。

- 13 天南生，〈小泉盜泉（三）〉，《台灣日日新報》3133號，1908.10.08，4版。本文《台灣日日新報》、《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查詢來源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大鐸版、漢珍版）」（來源：<https://hslib.sinica.edu.tw/?q=cht/node/4566>，檢索日期：2018.06.20）。本文引用《台灣日日新報》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之資料皆出於此，後續引用不再說明。
- 14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合著，張文薰翻譯，涂翠花校譯，〈關於在台灣的文學〉，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93-94。日文原稿於1940年10月（昭和15年）完稿，原刊於《愛書》14期（1941.05），王惠珍、橋本恭子校訂。
- 15 小泉盜泉，《盜泉詩稿》（日本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914.04）。此書是在小泉1908年過世後由後藤新平出資、館森鴻與小泉之弟小泉政忠共統整理出版的詩集，編輯者與發行人為本莊堅宏，印刷者為仙葉元太郎，1914年4月4日於東京發行。關於小泉盜泉生平與《盜泉詩稿》介紹可參看莊怡文，《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2018.03）。
- 16 館森鴻，〈序〉，收於關口隆正，《夢界遺文》卷一（日本東京：關口泰發行，1929.06），頁1。

國留學，就教於清末樸學大家俞樾（1821-1907）。¹⁷ 1894年應試於日本陸軍省，因其曾有中國留學經驗而獲選擔任甲午戰爭陸軍通譯官，1895年出版的《砲槍餘響》¹⁸即為一本記錄他從軍過程及其詩作的書籍。關口隆正1904年再次以陸軍通譯官一職參與日俄戰爭，1904年3月13日聞日本海軍於旅順口大勝清軍，欣喜之餘寫下《朝鮮歷史歌》。¹⁹ 他1897年至1901年曾任職於台中辨務署，1901年擔任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1902年擔任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囑託，1907年再任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囑託。²⁰ 由於小泉盜泉與關口隆正的漢學背景與行旅滿韓時間相近，故擇取兩位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研究目的在於說明來台日本漢文人之台灣經驗的重要性，透過文人詩文了解其行旅滿韓之所見所感，嘗試梳理近現代日本、台灣、中國（含滿洲）、韓半島之複雜國際政治關係所導致的文化位階與認同糾葛問題，其中具有文化中國符碼的台灣以及被視為小中華的韓半島，成為形塑日本漢文人中國觀與東亞觀之關鍵點。

二、「止戈」²¹ 況是問同文：小泉盜泉《途中雜詩》、「滿韓詩程」組詩

二十世紀初東北亞首場重大戰役日俄戰爭於1905年9月正式劃下句點，作

17 關口泰，〈父母一族のこと〉，關口隆克編，《空のなごり：默山關口泰遺歌文集》（日本東京：刀江書院，1960），頁117。八木繁樹，《關口隆吉の生涯一幕末・維新の隠れた偉傑一》（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83.08），頁206-209。

18 關口隆正，《砲槍餘響》（日本東京：福島棟三郎發行，1895.04），印刷者為堀田道貫，印刷所為堀田印刷所，此書為非賣品。本書有兩版本，分別為日本國會圖書館版本（流傳較廣）與靜岡圖書館版本，前者書寫時間為1894年9月28日至1895年1月24日，後者則為1894年9月28日至1895年6月15日，兩書皆著名「非賣品」，兩版本在時間重疊的部份內容相同，然而後者靜岡圖書館版本並無版權頁，無法確認印刷與發行之確切時間。故本論文採用的版本為日本國會圖書館版本。關口隆正日後又出版《續砲槍餘響》（1914），此書收錄於《支那時文談論》（1914），此書記錄的是日俄戰爭（約成書於1906年），然而因此書出版時間晚、內容較為鬆散，並無法確認是否全為1905年至1906年間所撰寫，是故暫不加入研究比較。

19 關口隆正，《朝鮮歷史歌》（日本大阪：石塚猪南藏發行，1904.04），標註者為西島良爾，印刷者為山中淺次郎。

20 其詳細工作經歷可參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資料庫（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檢索日期：2018.06.20）

21 小泉盜泉，〈寄懷來原小巒從軍在遼東〉組詩六首之第一首：「請纓殊域賦從軍，時會著鞭真讓君。漂鹵終應按徂旅，止戈況是問同文。戎軒本重陳琳檄，樛矢遙分肅慎雲。措大予欽幼安帽，莫教遺囑少傳聞。」《執徐集》，《盜泉詩稿》卷七（1904），頁56-58。

為戰勝國的日本取得對於南滿洲的控制並鞏固其對於韓半島的統治，關東州租借地與東清鐵路長春以南之路段均由日本控制，關東軍始在內滿洲駐紮。日本為了經營中國東北路權而成立的鐵路運輸企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於1906年成立，首任社長由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擔任。後藤新平於1905年日俄戰爭甫結束時即赴中國東北與韓半島一帶視察狀況，小泉盜泉則是以幕賓秘書身分隨同上北，小泉根據此行經驗與感想著有《途中雜詩》一卷（1905），此組詩作又於1906年5月至6月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與《漢文台灣日日新報》，連載大標題為「滿韓詩程」。²²《途中雜詩》與「滿韓詩程」詩作內容、字句大致相同，²³唯一差異在於《途中雜詩》錄有38首，「滿韓詩程」則有37首，前者多出的一首是小泉歸返東京過年所寫的〈京中除日〉，或許是歸家所寫之詩，與滿韓旅行關聯較小，因此在報刊連載時暫不發表。

1905年9月小泉盜泉自日本門司港離開，經過對馬海峽來到中國大連，於陸路上一路往東北走，經鞍山店抵達奉天北陵（昭陵），小泉盜泉對於長眠於此的清太宗皇太極有所感慨，寫下〈奉天北陵〉：

古殿抽林睥睨危，莊嚴經始記康熙。來當赤懸陸沈日，為弔瀋陽草昧時。石獸荊榛秋莽莽，風入感慨黍離離。清文皇帝闕宮道，無限黃昏鳥雀悲。²⁴

中國瀋陽的奉天北陵，其建築上的裝飾始於康熙皇帝。小泉來到此地正逢中國國土即將淪陷的時刻，看到眼前墓碑上淒涼荒蕪的石獸雕飾，秋日草木幽深、蔓延無邊，他心中有著無限感慨，哀嘆此國破家亡之悲。清太宗皇太極長眠於此，而今只留下日暮黃昏、鳥雀飛啼的惆悵悲哀。「赤懸」應為「赤縣」，

22 1908年小泉盜泉自殺過世後，《台灣日日新報》上刊載許多哀弔、紀念小泉盜泉的文章，其中1908年10月16日有一位署名「天南」者刊載〈小泉盜泉（十）詩學と詩品〉一文，內容特別強調「彼の滿韓詩程中には必傳の佳作が多かった」。

23 兩版本之詩作幾乎相同，此處以1914年正式出版的《途中雜詩》（收於《盜泉詩稿》）為主要版本。

24 小泉盜泉，〈奉天北陵〉，《途中雜詩》，《盜泉詩稿》卷九，頁65。

「赤縣（神州）」為中國的別稱。戰爭讓此陵寢變得殘破，小泉盜泉於此一遊，喟嘆此地簡直人事皆非，遍地淒涼景象，不曉得清太宗若地下有知，是否也有相同感受？

離開奉天後，他來到了昌圖，在遼寧北方的昌圖做了一組詩〈昌圖〉：

清晨登隴首，騁望爽於詩。烽堠諸軍遠，丸泥此局危。式微中立國，以
過近攻師。聞說鴻溝畫，臨風有所思。

野花吐絮雪紛紛，道是戰場閒可忻。五十萬人何處所，礮聲只在遠山
雲。²⁵

昌圖為遼寧省北方之一隅，小泉於清晨登高望遠，發現敵軍之烽火軍台雖然遙遠，但此要塞之封守已相當危急。中國在日俄戰爭中是衰微的中立國，中國因此畫定了界線以便日俄交戰，小泉盜泉聽聞後若有所思。下一首之開頭則以戰場外令人喜悅的野花景貌，反襯戰場內流離失所的五十萬人民，何處當去？因為此戰爭造成中國東北五十萬人民顛沛流離、無家可歸，詩末以遠山雲間的砲聲作為無言的結局。

離開昌圖之後，小泉來到了田庄台。田庄台曾是中日甲午戰爭戰地之一，其踞守遼河右岸，西望營口，東連錦州，南面渤海，成為控制敵船由海上入侵內河的要津。然而此地卻在甲午戰爭中落陷了，小泉盜泉因此寫了〈田庄台征清時至此旋師〉：

遺恨回旌已十春，眼看蠻觸動封畛。遼東豈是無歸鶴，爭奈風煙易主
人。²⁶

小泉盜泉寫作的此時，想到日本出兵至此返歸已十年，心中仍有餘憾，兩國竟

25 小泉盜泉，〈昌圖〉，《途中雜詩》，《盜泉詩稿》卷九，頁65-66。

26 小泉盜泉，〈田庄台征清時至此旋師〉，《途中雜詩》，《盜泉詩稿》卷九，頁66。

為了小利而起爭端、互侵疆界。小泉反問，遼東豈是無家可歸的鶴鳥？然而無奈此地風景就此易主了。「蠻觸」典出《莊子·則陽》，比喻為小利而起爭端。對於小泉來說，中日的爭端起於「韓半島」這個小利，看來他對於日本的主動引起戰端頗有微詞，然而戰爭已過了十年了，如今只剩感慨。

離開田庄台後，小泉往西南經過山海關、榆津鐵道，來到天津與北京，自塘沽船行至旅順港，經大連旅順雞冠山、遼寧省丹東市（中韓交界），最後來到平壤。平壤是歷史上中日戰爭的關鍵要地，如萬曆朝鮮之役（朝鮮方面稱壬辰之亂，朝鮮語：임진왜란（壬辰倭亂），日語：文祿・慶長の役）、甲午戰爭之平壤戰役等，小泉以壬辰倭亂史事抒感，寫下〈平壤〉：

休笑當年彌九郎，亦曾容易覆金湯。謬將懲毖作妖語，可賴欺瞞市國王。經界井田隨漫滅，籩簞箕廟飾荒唐。牡丹台上風雲惡，衰颯江山怨夕陽。²⁷

彌九郎為小西行長，幼名彌九郎，後仕豐臣秀吉，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之戰時，小西行長為日軍前鋒主將，其所率領的第一軍團首先佔領平安道，再續進攻平壤城。²⁸「謬將」指的是明官員沈惟敬，其對明遞交偽造的日本降書，掩蓋豐臣秀吉對明之意圖。朝鮮官員柳成龍以文言文將日本於明萬曆年間假借道朝鮮而行攻明之史事寫成《懲毖錄》（1695）。「箕子朝鮮」相傳為中國商朝宗室箕子於此地建立的王朝，部分學者與撰史者認為是箕子將文明帶入了朝

27 小泉盜泉，〈平壤〉，《途中雜詩》，《盜泉詩稿》卷九，頁67-68。

28 1590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即計畫入侵亞洲各地，1592年下達出戰朝鮮的命令，壬辰倭亂即指1592年至1598年中國（明朝萬曆年間）、日本、朝鮮之戰爭。1592年小西行長為第一軍團之將領，4月起攻，6月明朝軍隊進入朝鮮幫助朝軍，小西行長不敵砲火，後只好交出平壤城，豐臣秀吉遂有談和之意，命小西行長與明使沈惟敬講和斡旋。然而小西行長認為朝鮮不會接受豐臣秀吉的停戰條件，故和沈惟敬謀劃欺騙他們的主君（沈則因此對明朝遞交偽造的日本降書）。1596年9月豐臣秀吉發現此謀劃，1597年2月再次侵略朝鮮，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過世，日軍始從朝鮮半島撤軍，至年底日軍全數撤退，戰爭宣告結束。以上參考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08）；鄭樸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03），頁523-654。

鮮。²⁹中、朝邊界隨時間改換，然而箕子廟中的籩和鉶兩種祭事器具，彷彿正在文飾這段歷史的荒唐。平壤城北的牡丹台風雲變色，這一切難道都要怨怪日本嗎？

離開作為多次中日戰場的平壤，抵達南方的漢城（首爾），小泉有感寫下〈漢城景福宮內松林〉一詩：

夜劍霜飛艷血沱，故宮冤鬼哭如何。乾清殿外松林雨，朝士誰翻長恨歌。³⁰

1895年甲午戰爭後，朝鮮王朝高宗的王妃閔妃主張以俄國勢力牽制、抗衡日本，日本駐朝鮮公使遂指揮日守備隊員扮成浪人，入景福宮搜索閔妃，後閔妃於乾清宮坤寧閣中被日人殺害，³¹本詩前三句所言之史正為此事。然而對於閔妃之死，小泉看法究竟為何？末句僅以以唐玄宗、楊貴妃生離死別的淒美愛情故事〈長恨歌〉之譬喻作結，小泉並未直接言明其對於閔妃之死的看法，然本詩第二句之「冤鬼」一詞，是否暗示了小泉認為閔妃死有餘冤？

綜觀小泉的滿韓行旅，對於逐漸衰頹的中國滿清充滿了同情與遺憾之感，相較於同時其他日人對於東亞時局所持有的高度期待與洋洋得意之情，小泉反而關注的是無故被犧牲的人民，並對日薄西山的滿清王朝寄與同情。在小泉眼中，「文化中國」或許是理想的，然而「現實中國」卻僅剩無盡遺憾，此刻衰敗的滿清不僅拖累韓半島，更進一步遷怒日本，「止戈」之理想恐怕亦是走向破滅。

29 《高麗史》63卷，志卷17「（肅宗七年，1102年）十月壬子朔：『禮部奏：我國教化禮儀，自箕子始，而不載祀典。乞求其墳塋，立祠以祭。』」

30 小泉盜泉，〈漢城景福宮內松林〉，《途中雜詩》，《盜泉詩稿》卷九，頁68。

31 閔妃（1851-1895），本名為閔茲暎（Min Jayeong），韓國作家鄭飛石在1891年出版的歷史小說《閔妃》漢譯為「閔紫英」。閔妃是朝鮮王朝高宗的王妃，純宗的母親，本貫為驪興閔氏，閔氏集團在朝廷極具影響力，閔妃在甲午戰後欲與俄國合作、對抗日本，引起朝鮮親日派的不滿。1895年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樓帶領同行者入侵朝鮮宮廷，弒殺閔妃成功，1897年高宗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正式稱帝，追諡閔妃為「明成皇后」。以上參考角田房子，《閔妃暗殺—朝鮮王朝末期の国母—》（日本東京：新潮社，1993.07）。

三、為東洋的「和平」而戰：關口隆正《砲槍餘響》、《朝鮮歷史歌》

關口隆正的滿韓之旅時間早於小泉盜泉，他於《砲槍餘響》序中自言其旅居於此之因：

閒居山村吟賞風月非吾願也，奉職鄉校教授子弟非吾志也，家弟年長、妻兒共健，於是飄然去國，寓於東京會。又清韓之事，蹶起提劍、自進應試，從軍北征，然人世百年、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吾願將達而志未伸也。陣營無事，情性相感，發成詩章，遂得若干首，因題曰「砲槍餘響」。乙未一月念七於旅順口

行政公署關口隆正並書³²

相較於其他受過日本漢學教育的漢文人，關口隆正並不喜「吟賞風月」、「奉職鄉校」，他選擇離開家鄉從軍去，清韓之事指的就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關口隆正將這段軍旅生活感想撰為詩章，題名曰《砲槍餘響》，在1895年1月27日寫下此序。

關口隆正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到兩項特點，第一，關口隆正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擁護與讚美，第二，關口隆正強調日本對韓半島之長久「友誼」關係。首先，他在此著作首篇〈示李鴻章詩并引〉中表達對於李的負面觀感：「蓋鴻章以彼國情、計我國情，自許自驕，輕我侮我，未知我邦固有千載不拔之美風，遂致今日，計無所出，亦真可憐哉！」³³〈示李鴻章詩〉中亦有一句「李爺傲慢心已盲」，再註「余甚不為鴻章取也」，不禁令人懷疑，其對於李鴻章是否懷有私人恩怨？然而，再看下一首〈快快詩史引〉，關口隆正說明「快快」意即「快之又快者」，指讓自己大快人心之事，而能讓他「快快」之事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大勝中國之事，而李鴻章於中日交涉時的情態正是關口隆正所不喜者：

32 關口隆正，〈序〉，《砲槍餘響》，頁1-2。

33 關口隆正，〈示李鴻章詩并引〉，《砲槍餘響》，頁1。

可畏者，李鴻章耳，可惡者，亦李鴻章耳。蓋鴻章之待各國使節，婉容媵色，以逢強國之歡心，噓喝勵聲，以見自家之意氣，陽笑陰慍，內怯外剛，背從不定，變幻無極，處事於模稜揣摩間，結局於曖昧模糊中，……余以為復讎報怨，宿意漸霽，不亦宜哉？乃作示鴻章詩，以自遣懷焉。³⁴

此段除了明白表明不喜之處，也說明所謂「復讎報怨」並非欲報私仇，而是就情勢而產生的個人感受。此外，在〈羊叔子〉³⁵一詩中，關口隆正又舉1885年日使因前一年之「甲申事變」而赴天津媾和，李鴻章盛宴款待之，卻在宴中使譯官對日使說「酒中有毒」一事，說明李之狡詐陰險，然而今日的李鴻章與其所屬之滿清已不能與日為敵，故關口隆正感到無比快意，並「竊為清國悲之」。³⁶

關口隆正在為中國感到遺憾之餘，事實上正是為日本帝國的發展感到昂揚、興奮，在〈快快詩史引〉中他即表達「余之所以狂喜不能自禁者，大異于世人，不獨戰勝攻取一事，譬猶藉一 天子之威靈、與將軍之勇武，復君父之讎，報積年之怨」。³⁷是故，於冬春天寒地凍之時從軍打仗，他的感覺竟是「從軍數日似春遊」、³⁸「日章旗幟舞春風」、³⁹「悠然跨馬始開顏，笑看砲台流血斑，萬世誰忘今日績，一鞭凌駕二龍山」，詩句中滿溢著對於日方戰勝的歡愉，並展現了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之極致。然而，作為中日兩方之戰地韓半島，關口隆正於〈申叔舟〉⁴⁰一詩前註明言「請勿與日本失和矣」，中韓歷來有著交流關係，古代朝鮮之「事大主義」使其「知有清國，不知有日本」，雖然中、韓間有著微妙的文化淵源，但日、韓間事實上有著更重要的友誼關係。這樣的立場在關口隆正1904年所出版的《朝鮮歷史歌》更為明顯，《朝鮮歷史

34 關口隆正，〈快快詩史引〉，《砲槍餘響》，頁3。

35 關口隆正，〈羊叔子〉，《砲槍餘響》，頁4。

36 關口隆正，〈從軍日詩中篇〉，《砲槍餘響》，頁17。

37 關口隆正，〈快快詩史引〉，《砲槍餘響》，頁2。

38 關口隆正，〈從軍日詩中篇〉，《砲槍餘響》，頁12。

39 關口隆正，〈從軍日詩中篇〉，《砲槍餘響》，頁15。

40 關口隆正，〈申叔舟〉，《砲槍餘響》，頁5。

歌》此書寫於1904年日俄戰爭時，日軍於旅順口戰勝傳來捷報時，寫的雖是韓半島歷史，但其重點卻在於「保全韓半島的重要」。他認為若是中國滿洲為俄國（露國）所佔，則韓半島的保全與否正關乎東亞的和平：

我ハ韓國萬世の
為めに起せし仁義の師
一患除けば又一患
暴慢無禮の彼露國
.....
滿州朝鮮を併吞し
鷲梟の雄を振ひける
彼の存亡我安危
繋る大事を餘所にして
.....
文明を平和に求め列國と
友誼を篤くし玉ひて
韓國保全を慮るは
一朝一夕の故にあらず⁴¹

關口隆正說明日本這一次的戰爭（指日俄戰爭）是為了韓半島／大韓帝國萬世之仁義而發動，罪魁禍首就是傲慢無禮的俄國（露國），「鷲梟」指兇猛的人，諸列強無不振翅環繞韓半島、覬覦垂涎此地，而韓半島的存亡正與我日本安危相繫，這就是日本之所以要干涉、出兵之因。此外，此次出兵除了考慮韓半島之安危外，更由於日、韓間有著兩千年篤厚的友誼，因此日本也替韓國於諸列強國間尋求平和，日本是為了東洋的長治久安而戰。

相較於小泉盜泉，關口隆正的滿韓之旅雖同樣對於滿清的衰頹有著同情

41 關口隆正，《朝鮮歷史歌》，頁32-33、頁35-36。

與遺憾之感，但卻多了得意洋洋的帝國主義戰勝視角，並且表達對於李鴻章的負面觀感。關口隆正並未提及韓半島與中國過往的文化淵源，而是刻意強調日、韓友好關係，且日本是為了東洋的和平以及韓國萬世之仁義而出兵。日本出於對於韓的「友誼」與累世關係，力保韓半島，於西方列強間尋求「和平之道」，俄國才是東亞戰爭的罪魁禍首。這樣的「和平」，同樣是「止戈」，卻與小泉盜泉思考的出發點與思想內涵大相逕庭。

四、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下的兩個「中國結」：文化中國與小中華韓半島

小泉盜泉早年一心欲以漢學達治世之用，然而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社會，漢學的重要性逐漸被西學與國學取代，如小泉盜泉的好友館森鴻亦懷有漢學夢，學成後回家鄉欲開設漢學塾，卻因招收不到學生而中止計劃，改轉向殖民地台灣尋找事業發展。整體而言，小泉盜泉的詩作多滿溢懷才不遇、遠鄉飄零的負面情緒，性格孤僻的他在職場上亦直言不諱，在《台灣日日新報》工作時（1900-1901）因堅持刊登〈政局の醜事〉一抨擊伊藤博文內閣之文章，與報社社員產生衝突，後遂辭職。然而，在其居台時期，卻較常出現一些「因美景而產生恬靜感」的詩作，如〈關渡〉⁴²（1900）、〈渡老濃溪〉⁴³（1903）、〈遊草山〉⁴⁴（1904）等，與他陰暗又充滿鬼氣的平日詩風大相逕庭。如本論文第二章，筆者說明小泉盜泉在詩作中表現一種遺憾「文化中國」不再復返的情感，並且體認到「現實中國」的殘破不堪；然而殖民地台灣的前宗主國正是中國，使得台灣在他心中似乎存有一點文化中國的氛圍，換言之，他的台灣行旅與經驗，儘管是失意而不得不的一段生命旅程，但卻因為地點是台灣這一個擁有「文化中國」標籤的地方，使得滿身落魄而憤世嫉俗的小泉盜泉在此似乎

42 小泉盜泉，〈關渡〉：「亂篁十里水風搖，觀世音山指不遙。江鳥海雲天遠大，舟乘關渡夕陽潮。」《南游存稿》（亦名《困敦集》），《盜泉詩稿》卷三（1900），頁36。

43 小泉盜泉，〈五月以官事南巡決月而歸所獲唯有兩首 渡老濃溪〉：「雲末鳳猴經已返，油轎竹筏當舟車。道從早稻熟邊過，日向亂蟬嘶處斜。野渡泥抽水牛角，山風晴弄木棉花。隔溪煙火旅愁外，戍角高低響晚霞。」《單閣集》，《盜泉詩稿》卷六（1903），頁50。

44 小泉盜泉，〈遊草山〉：「桃花灼灼雨如塵，雞犬青山總是春。泉石應猜招隱客，武陵何必古遺民。」《執徐集》，《盜泉詩稿》卷七（1904），頁54。

得到一些愜意與平靜。

因此當一向自命清高、孤芳自賞的小泉盜泉1904年於台北成立古典詩社「淡社」（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命名之）、1905年參與後藤新平所組的讀書會、1907年與館森鴻等人在台北合組哲學研究會等，種種活動都說明了這位曾被稱為「台灣の三變物」⁴⁵的奇特之人漸漸走進人群，台灣的山水風貌與生活經驗或許給了他一些啟發與力量。然而，在此過程中，他心中對於「文化中國」的執念尚存，在1903年他還未踏上中國東北土地時，他寫下〈失題〉組詩：

煩冤鬼哭唧啾啾，蒸日黃昏弔滿洲。豎子元招後門虎，鄰人擬奪逕田牛。爛柯棋局新生面，斫案軍刀舊話頭。一笑沙蟲蠹無數，謾臨滄海問橫流。

大東杼軸奈空懸，久矣文臣只愛錢。定霸春秋非一國，保身明哲是何年，誰拚孤注為投采，人道六郎頗勝蓮。狗彘紛呴四萬萬，可憐抵死拜腥羶。⁴⁶

第一首詩提到日、俄於中國東北之戰爭禍及許多無辜民眾，中國人（豎子）去招惹了住家後邊的老虎（俄國），而鄰人（日本）又欲競奪田牛，簡直是禍不單行。此處引用了《左傳》「蹊田奪牛」典故，意指懲罰過重，指中國對外戰爭損失慘重。然而第二首首句頗值得玩味，「大東杼軸奈空懸」，小泉恐怕認為日本並非「大東杼軸」，而且「定霸春秋非一國」。末兩句則以豬和狗譬喻盼能改革國政的中國朝中人，但是即使他們在被屠宰前千萬抵抗，最後也只能被用來當作祭品。詩句在感嘆中國之餘，似乎對於日本稱霸東亞懷持疑問。

小泉盜泉的滿韓之旅始於1905年9月，至1905年底結束，他隨即返回東京度過新年。隨著日俄戰爭的結束，日本開始積極著手經營滿洲、鼓勵民眾至

45 小觀子，〈台灣の三變物〉，《台灣日日新報》2480號，1906.08.05，3版。另外兩位同被稱為奇特之人者為館森鴻與伊能嘉矩。

46 小泉盜泉，〈失題〉組詩六首之第一首與第二首，《單閣集》，《盜泉詩稿》卷六（1903），頁52-53。

滿韓一帶旅行。例如，1906年7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學生滿韓旅行〉⁴⁷一文，報導日本中學校以上之畢業生搭乘陸軍所轄之船舶至滿韓一帶進行修學旅行。7月17日則刊載〈滿韓旅行學生之先發隊〉⁴⁸一文，報導全國學生多利用暑假搭乘陸軍御用船至滿韓旅行，如鹿兒島造士館有一百名，東京高等師範學生約五百名，皆訂於7月15日或19日出發，自報導附表的總人數統計，約有三千五百名學生至滿韓旅行。而〈第三回滿韓旅行學生〉⁴⁹一文則刊於7月29日之《台灣日日新報》，此次學生旅行自宇品搭乘神宮丸出發，有來自京都府的學生250名、來自和歌山縣的學生72名、來自石川縣的學生60名、來自富山縣的學生53名、來自東京府的學生18名、來自神戶78名、來自慶應義塾的學生84名、來自早稻田大學的學生46名、來自開城學校的學生27名、來自麻布獸醫學校的學生11名、來自成城學校的學生12名，以上合計共721名。行旅滿韓在當時已成為一種時尚風氣，然而，為何會形成這樣的風氣？這樣的風氣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由於南滿鐵路的開通，日本人於當地經營的旅館漸多，尤其1906年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建立，使得鐵路沿線區域的日人觀光基礎設施日益增進。日本實業家和民間人士在參觀日俄戰爭遺址的同時，開展官民協作，在這些地區開拓殖民地，提升了日本人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的民族自尊心。這也是日本政府為了鼓吹將中國和朝鮮等被他們視為落後國家變成殖民地，所進行的一種政治宣傳。⁵⁰因此，1906年日本全國中學的聯合「滿洲旅行」，目的多在於尋訪日俄戰爭遺跡，向學子宣傳日本作為戰勝國的光榮感與自尊心，使其親身體驗日本帝國領土的「廣闊」。然而就歷史發展軌跡而言，韓半島與日本同受中國千年來文化之影響，韓半島更曾為中國的朝貢國，東亞三國的近代國際地位與歷史糾葛在此產生錯綜複雜的闡釋空間。

基於小泉盜泉對於文化中國的執念以及殖民地台灣的經驗，他的滿韓行旅

47 〈學生滿韓旅行〉，《台灣日日新報》2455號，1906.07.07，1版。

48 〈滿韓旅行學生之先發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2463號，1906.07.17，1版。

49 〈第三回滿韓旅行學生〉，《台灣日日新報》2474號，1906.07.29，3版。

50 金文學著，馬今善、鄭炳男中譯，《重新發現近代：一百年前的中日韓》第一部（中國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01），頁42-43。

充滿了遺憾與失落之感，與日俄戰爭後日本推展的「滿洲旅行」之意義迥異，1907年任職於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關口隆正，或可作為另一研究對照組。關口隆正的兩次滿韓之旅時間分別為甲午戰爭前後（1894-1896）與日俄戰爭前後（1904-1907），其中1897年至1907年間擔任過台灣總督府多項官職。他雖受過漢學教育，但作為一個武將，自言「閒居山村吟賞風月非吾願也」，進而選擇從軍效國，因此在他的詩作中，很明顯可以嗅出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之積極歡欣感。然而在日人屢屢戰勝後，他不能避免地必須去直視日本、台灣、中國（含滿洲）、韓半島之間糾葛的政治與文化關係。

1899年9月《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台中地區的土匪問題，因為「無智的愚民」心生恐懼而導致流言四起，進而導致土匪蜂起，身為台中辨務署長的關口隆正為平息亂局，遂至鹿港、彰化、梧棲、葫蘆墩等地之街莊區長處討論並處理此問題；⁵¹ 1900年8月他再次親自駕臨牛罵頭、梧棲港等處，召集各區長討論民亂問題，台灣民間因中國義和團事變而使得謠言四起，關口隆正則下鄉了解並欲使謠言止息、民眾安居樂業。1901年《台灣日日新報》續報導，因本年初台中土匪襲城事件，⁵² 地方官關口隆正經台灣總督府審查後認定須受懲戒處分，按懲戒令法規條例須應年俸額照計月攤罰減五分之一。⁵³ 由此可知，關口隆正的工作必須站在第一線直接面對街莊區長與人民，且由於當時仍處於日治初期台灣動亂尚未平息的狀態中，情況可能更為棘手，相較於小泉盜泉作為報紙記者、民政長官秘書等靜態文職，關口隆正更能直接感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力道。此外，關口隆正在來台工作前，已在中國學習一段時間並參與了甲午戰爭的戰地工作，他對於現實中國的了解應比多從聖賢典籍中汲取知識的小泉盜泉深刻，即使他曾有過對於文化中國的幻夢，在經過多次戰役與生活的洗鍊，應也漸漸體認到其中的差異。然而，即便關口隆正躲開了「文化中國」這一個「中國結」，他還是得面對另一個「中國結」——韓半島。

韓國學者白永瑞認為，在韓半島，高句麗早就以「華」自處，將周邊民族

51 〈關口台中辨務署長の巡回〉，《台灣日日新報》420號，1899.09.23，2版。

52 〈署長鈞諭〉，《台灣日日新報》693號，1900.08.22，3版。

53 〈懲戒有因〉，《台灣日日新報》890號，1901.04.24，3版。

納為屬民，朝鮮王朝世宗和世祖在對女真的政策上，也同樣接受女真的朝貢，也滿足日本稱朝鮮為「大國」或「上國」。朝鮮後期，當滿族建立的清朝統治中國大陸以後，朝鮮更以「小中華」自居。如果把這些歷史現象看作對「中華思想的分享」，那麼這一地域也許就可以被稱作「中華思想共用圈」。在中華秩序下處於周邊偏邦地位的日本，在此時取代沒落的中華帝國，從而具有「華」的地位（所謂的「華夷變態」），漸漸鞏固日本帝國勢力範圍的基礎，在列強勢力同盟的趨勢下，上升為此一地域的「中心」，建立「大東亞共榮圈」⁵⁴。在此華夷變態中，「中國」與「中國學術」成為日本近代思想史轉向中的關鍵點，在此，已有多位學者對此提出專業的見解，⁵⁵筆者過去亦撰有相關論述，本文不多贅述。在此研究基礎下，筆者想提出的觀察是：中國與中國學術是日本近代史中不可忽視的「他者」，曾屬於大清帝國的台灣在成為日本殖民地後，使得日本更深刻地感受到此糾葛問題，產生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下的「中國結」；同理，與中國歷代有著密切交流的小中華韓半島，在日本處心積慮欲佔為己有的過程中，亦產生了同樣的糾葛問題（另一個「中國結」），這份糾葛則體現在日本近代知識人身上，曾受過漢學教育者受其影響更深。

小泉盜泉認為韓半島（大韓帝國）於當時的犧牲，是因殘敗的中國拖累韓半島所致，其對於中國與韓半島寄予同情。如〈漢城景福宮內松林〉一詩，以具抗日意識的閔妃／明成皇后冤死日人手下之歷史事件抒情，強調閔妃／明成皇后的「冤」與「恨」，以她與朝鮮高宗之間淒美的愛情故事美化此歷史。相較之下，關口隆正強調日本是為了東洋之和平而戰，而使日本必須出戰的禍首正是俄國，避開中國與日本、中國與韓半島長久以來的文化淵源問題，強調日韓的友好關係，認為日本佔有韓半島是出於對韓之友誼，是因為日韓有著累世的關係故力保韓半島。筆者認為關口隆正「避開中、日、韓的文化淵源問題」並且「強調日韓友誼」，正表示他無法透過梳理這些糾葛問題而邁向近代日本

54 白永瑞著，王元周等譯，《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07），頁7-10。

55 台灣學者如黃美娥、黃俊傑、陳瑋芬等，中國大陸學者如嚴紹盪、張伯偉、王曉平等，日本學者如竹內好、溝口雄三、子安宣邦、小森陽一、安田敏朗等，三地學者族繁不及備載，分別自文學、文化、語言、政治等層面，深入研究日本近代漢學與思想轉變的歷程及其意義。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因此他擱置此問題，直接邁向近代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換言之，小中華韓半島正是他的另一個中國結。⁵⁶

十八世紀末葉的日本帝國主義思想於其境內相當盛行，如本多利明主張侵佔樺太（庫頁島）與滿洲，佐藤信淵主張併吞滿洲、吉田松陰主張依序納併朝鮮、滿洲、台灣、呂宋，橋本左內主張與俄簽訂同盟條約、再前進滿韓等。這些幕末知識分子之所以會產生此類帝國主義主張，一部分是由於西方帝國勢力東漸，日本知識人欲同以帝國主義侵略反向擴大日本防線。此帝國主義發展以甲午戰爭作為一分界，戰前偏向自我防衛性質，戰後則偏向自我肥大症。自山縣有朋的思想來看，他認為戰前雖屬防衛，但俄國勢力已漸由中國東北向韓半島推進，直接威脅日本本土，因此日本即將防衛線拉至韓半島。⁵⁷ 竹內好稱呼此自我肥大症為亞細亞主義，⁵⁸ 他懷疑日本對於韓半島亦侵略、亦防護（連帶關係）的態度是否能具體區別，「日韓合併」也不能說其中沒有同時防衛俄國與中國「侵略」日本帝國這一層面的考量。⁵⁹ 子安宣邦則進一步闡釋，日本產生帝國主義式的大陸擴張需求膨脹主義，其中也必然包含穩固日本在亞洲地區基礎的目標。⁶⁰

狹間直樹則認為亞洲主義的誕生與歐洲對亞洲的侵略有關，亞洲主義在近代亞洲各國為互相團結合作以對抗歐洲的背景下產生，亞洲內部的平等關係為此主義之前提。然而較早完成維新的日本，卻放棄與亞洲諸國平等的團結合作，以日本優勢為軸心轉而謀求侵略活動。⁶¹ 日韓合併一事無論是出於侵略目

56 關於關口隆正的東亞觀，筆者認為其1900年出版之《台灣歷史歌》（日本東京：村田直景發行，1900.04）書內附圖（無頁碼）或可做為呈現其觀點之圖像，請參考本論文「附錄二」關口隆正《台灣歷史歌》（1900）之內附地圖。圖片下方的灰色區域為日本屬地（包含殖民地台灣），而上方的中國與韓半島皆屬白色區域，白色區域是日本正待漸漸向上蠶食鯨吞的區域。

57 李永熾，《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新北：稻鄉出版社，1998.05），頁276。

58 竹內好認為各種亞細亞主義／亞洲主義的內容差異極大，有時與膨脹主義或侵略主義完全不同，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民主義以及國粹主義也完全不同。但上述主義均有重合的部分，其中亞洲主義與膨脹主義有許多相通之處，且亞洲主義是明治維新革命以後自膨脹主義中誕生的一個果實。以上參考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63.08）。

59 竹內好，〈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伊藤整編，《近代化と伝統》（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 第七卷）（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59.11）。

60 子安宣邦著，林鍵麟譯，〈近代日本對抗軸——亞細亞主義：日本近代史與戰爭的二重性〉，《文化研究》6期增刊（2008.09），頁55。

61 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02），頁3-4。

的或是防護目的，都無法忽略中國與韓半島和日本之間的歷史淵源與文化交流史，內藤湖南正提醒了諸位研究者，朝鮮半島是同日本關係最密切的地區，也是中國古代文明傳入日本的重要通道，如果沒有朝鮮半島的中介和過渡，日本文明開化的遲緩是不難想像的，⁶² 於此，韓半島與日本、中國與日本、中國與韓半島之間的文化高低位階關係頗令人玩味。事實上，非受漢學教育之新時代日本知識人，亦對日韓合併提出質疑。如日本國民詩人石川啄木（1886-1912）即對此提出了批判，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批判日本的國家主義，譴責「朝鮮輕蔑論」。鶴見俊輔在《現代日本思想史》高度評價石川啄木：「石川啄木從各個角度出發，去思考這個被稱為日韓併合的政府行為，給日本人和朝鮮人帶來怎樣嚴重的後果，像他一樣具有這種反思能力的日本人，在當時是罕見的。石川啄木正是這樣一位罕見的詩人。」⁶³

誠如內藤湖南所說，地理、歷史上的淵源使中國及其文化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存在，如果想要繞開中國及其文化的影響，日本文化就無從談起。⁶⁴ 而帶有「文化中國」符碼的近代中國，以及深為古代文化中國薰陶、影響的韓半島，這兩個「中國結」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下背上之芒刺，無論日本帝國出於防衛或侵略的心態合併、佔領韓半島與中國，在歷史淵源、文化位階、國際關係等各層面都無法妥善地自圓其說，成為日本近代史與思想史中弔詭的一頁。

五、小結

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主義逐漸興起的時刻，整體而言日本漢學雖漸走下坡，但仍呈現些微小規模且短暫的繁盛，主要由於日本政府意識到全盤西化的教育模式帶來諸多弊端，1881年在東京大學增設「古典講習科」一事即可視為政府之應對動作。印刷術的普及加快了書籍的流通，報紙、雜誌的出版與流通為漢文學作品的發表提供了園地，並擴大影響力，如最早刊登漢詩的報紙正是東京四大報之一的《朝野新聞》（1874年創刊），社長城島柳北（1837-

62 內藤湖南著，劉克申譯，《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頁17。

63 鶴見俊輔，〈日本の中の朝鮮〉，《現代日本思想史》（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91.05），頁82-83。

64 內藤湖南著，劉克申譯，《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頁5。

1884）親自審閱稿件，他亦是當時日本著名的漢文人。其他如漢詩文雜誌與社團的成立，都對於漢學的發展帶來正面助益。而這樣的發展儘管到了大正年間出現不同的意義，⁶⁵然而就結果而言，漢詩文並沒有在日本完全消失。漢文人即使對於中國古典學術的浸淫較深，然而此素養不能完全決定其政治意識，大部分漢文人對於「（古典）文化中國」有著欣慕之感，對於「現實中國」可能也帶有同情之感，但他們也可能是支持「征韓論」的一群，如佐田白茅、西鄉隆盛、副島重臣等，皆主張侵略韓半島。

明治維新後，具帝國主義侵略特色的國家主義雖成日本的主要發展策略，然而光明治時期所生成的國家主義相關論述極相當複雜，就韓半島而言，征韓論／日韓合併論一直屬於思想主流，支持者眾，福澤諭吉亦表明朝鮮為日本的防禦線，⁶⁶然而在福澤諭吉的〈脫亞論〉裡，又認為日本不應該猶豫，與其坐等鄰國開明、共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方各國共進退，不須對其特別同情，僅需模仿西方國家對待他們的態度即可，日本要謝絕中、韓這兩個壞朋友。⁶⁷「征韓／日韓合併」與「脫亞」看似矛盾，但事實上正因為日本已將「脫亞」作為基礎，進一步「征韓」，日本之所以合併韓半島，是由於日本已不再將自身視為亞洲之一國，已躋身西方強國之列，故不需設身處地為亞洲諸國著想。故在此思想脈絡下，就結果論而言，知識分子不需要同情、緬懷或幫助中國與韓半島，自「文化中國」與「小中華」延伸而來的中國結看似無效，但卻在日本知識分子邁向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產生無數歧異與自我認同的困惑。

亦在此時，日本漢文人心中的中國觀與東亞觀，較之西學者，更為複雜且矛盾。誠如黃俊傑所說，「即使對於近代現實中國有著嫌惡，也無法隱藏其對

65 日本漢學之所以能在近代日本快速變換論述方式，關鍵在於漢文學／漢學已漸從明治時期以前的個人學養，轉變為大正、昭和年間以後的學院專業科目並持續發展。當日本漢學成為學院中的專業科目後，它足以與東亞各國新式學院中的相關科系競爭，日本漢學並不會因為它非漢學的最初源流，而在表現上輸給中國。詳見莊怡文，〈近現代閩台關係下的林本源家族古典文學及其相關活動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頁79-85。

66 福澤諭吉，〈朝鮮は日本の藩屏なり〉，山田聰編，《福澤諭吉 朝鮮・中国・台湾論集：「国権拡張」「脱亞」の果て》（日本東京：明石書店，2010.10），頁146-151。原文發表於1887年。

67 福澤諭吉，〈脱亞論〉，山田聰編，《福澤諭吉 朝鮮・中国・台湾論集：「国権拡張」「脱亞」の果て》，頁16-23。原文發表於1885年。

於古代文化中國的嚮往，這是明治維新之後日人中國觀互為矛盾的兩面」。⁶⁸ 生於幕末維新之際的日本漢文人，自小之漢學教育使得「文化中國」成為其精神原鄉，在華夷變態的時代更易產生疑惑。在1895年日本統領台灣至1910年合併韓半島之間，多數日本近代知識人因蓬勃的國家主義、對外戰爭勝利等產生了更為昂揚的東亞觀，而部分漢文人心中則多了一絲遺憾與同情，產生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下的兩個中國結。親身來過台灣者，更能深切體會這樣矛盾，如中村櫻溪在〈石壁潭賦並序〉中將台灣（台北）想像成黃州赤壁，並學習東坡〈赤壁賦〉秋日遊江賞月的雅興正是一例，⁶⁹ 而有著台灣行旅經驗再赴滿韓者，其對於近代中國、日本漢學、與日本帝國主義更可能產生多重看法，呈現出日本近代知識人對於國家構想的多元可能。本文以小泉盜泉與關口隆正兩位作為例子，發現兩位的滿韓行旅都與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有關，懷有「文化中國」理想的小泉對於滿、韓較具有同情眼光，而早年遊學中國又親身參與甲午戰爭的關口則強調日韓友誼關係，避開中日／中韓文化淵源，兩者都對「現實中國」感到遺憾，「文化中國」與「小中華韓半島」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兩個「中國結」。



68 黃俊傑，〈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張寶三、楊儒賓所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頁279-321。

69 莊怡文，〈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5號（2011.06），頁315-342。

「附錄一」

小泉盜泉《途中雜詩》與「滿韓詩程」組詩詩作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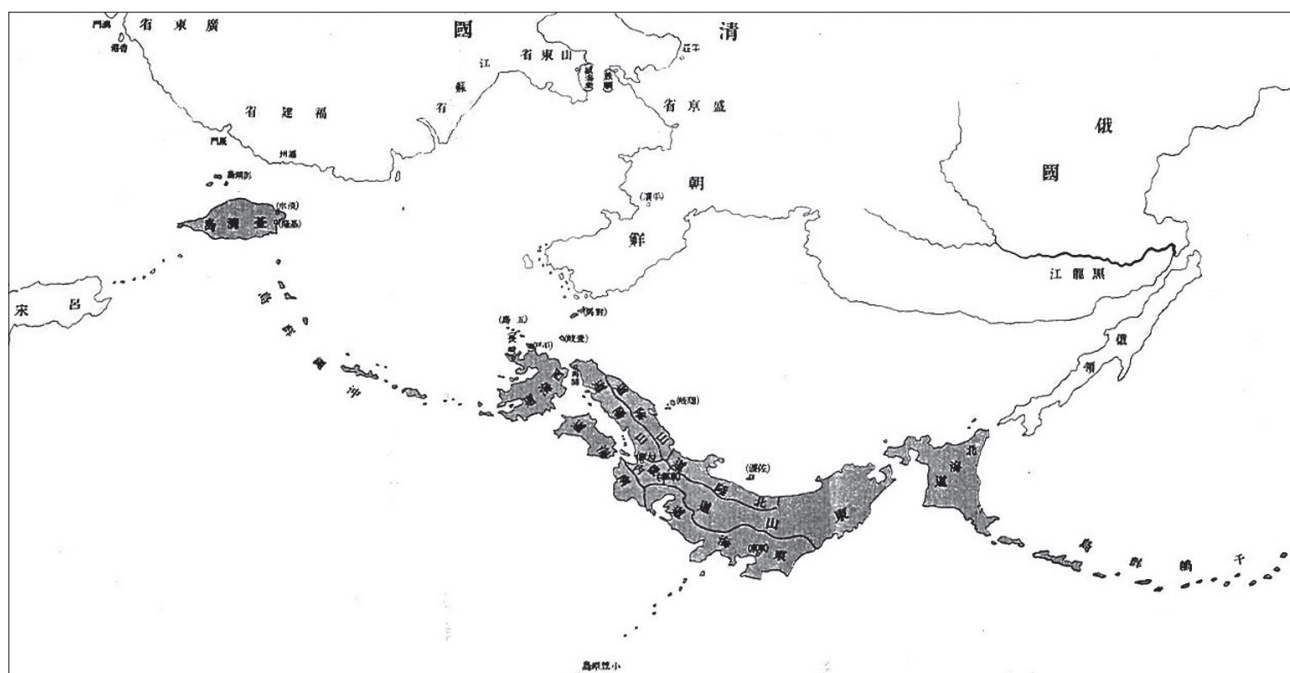
編輯體例

1. 表格中之詩作順序以《台灣日日新報》之刊登先後順序為序。
2. 同一首詩作之兩個版本，若兩版字句內容不同，則在詩題前以「*」記號註明。關於兩版本之詩句對照，若屬古今異體字之差異，則視為相同字詞。

《台灣日日新報》「滿韓詩程」組詩詩作	《台灣日日新報》發表時間	《途中雜詩》詩作（1905）
*〈滿韓詩程（一）・門司〉	1906.05.23	*〈門司〉
*〈滿韓詩程（一）・藝州〉	1906.05.23	*〈藝州〉
〈滿韓詩程（一）・入都雜感〉	1906.05.23	〈入都雜感〉
*〈滿韓詩程（二）・將向滿洲宇品寄高野竹隱〉	1906.05.24	*〈將向滿洲宇品寄高野竹隱〉
〈滿韓詩程（二）・對馬水道〉	1906.05.24	〈對馬水道〉
〈滿韓詩程（二）・大連〉	1906.05.24	〈大連〉
*〈滿韓詩程（二）・鞍山店（昔征清時我師北進止于此）〉	1906.05.24	*〈鞍山店昔征清時我師北進止于此〉
*〈滿韓詩程（三）・奉天呈兒玉大將〉	1906.05.25	*〈奉天呈兒玉大將〉
*〈滿韓詩程（三）・奉天之戰余舊藩主及親故武弁多死之城外揚氏屯是家弟苦戰被創處〉	1906.05.25	*〈奉天之戰舊藩主及親故武弁多死之城外揚氏屯是家弟苦戰被創處〉
〈滿韓詩程（三）・奉天北陵〉	1906.05.25	〈奉天北陵〉
〈滿韓詩程（三）・昌圖〉、〈滿韓詩程（四）・昌圖〉	1906.05.25-05.26	〈昌圖〉組詩三首，第一首刊於〈滿韓詩程（三）〉，第二、三首刊於〈滿韓詩程（四）〉

〈滿韓詩程（四）・田庄台（征清時至此旋師）〉	1906.05.26	〈田庄台征清時至此旋師〉
〈滿韓詩程（四）・山海關懷古〉	1906.05.26	〈山海關懷古〉
* 〈滿韓詩程（四）・榆津鐵道所見〉	1906.05.26	* 〈榆津鐵道所見〉
〈滿韓詩程（五）・天津酒樓題壁〉	1906.05.27	〈天津酒樓題壁〉
〈滿韓詩程（五）・昌黎作〉	1906.05.27	〈昌黎作〉
〈滿韓詩程（五）・北京客夜〉	1906.05.27	〈北京客夜〉
〈滿韓詩程（六）・塘沽〉	1906.05.29	〈塘沽〉
* 〈滿韓詩程（六）・旅順東雞冠山北砲台是露將孔得先科戰死處〉	1906.05.29	* 〈旅順東雞冠山北砲台是露將孔得先科戰死處〉
* 〈滿韓詩程（七）・安東〉	1906.05.30	* 〈安東〉
〈滿韓詩程（七）・平壤〉	1906.05.30	〈平壤〉
* 〈滿韓詩程（七）・漢城景福宮內松林〉	1906.05.30	* 〈漢城景福宮內松林〉
* 〈滿韓詩程（七）・釜山夜發〉	1906.05.30	* 〈釜山夜發〉
* 〈滿韓詩程（八）・舞子雜詠〉	1906.05.31	* 〈舞子雜詠〉
〈滿韓詩程（九）・再入都感事〉	1906.06.01	〈再入都感事〉
〈滿韓詩程（九）・馬關春帆樓〉	1906.06.01	〈馬關春帆樓〉
* 〈滿韓詩程（九）・言歸〉	1906.06.01	* 〈言歸〉
〈滿韓詩程（九）・呈棲霞長官〉	1906.06.01	〈呈棲霞長官〉

「附錄二」 關口隆正《台灣歷史歌》（1900）之內附地圖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八木繁樹，《關口隆吉の生涯一幕末・維新の隠れた偉傑一》（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83.08）。

小泉盜泉著，《盜泉詩稿》（日本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914.04）。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

井口和起著，河源湖譯，《日俄戰爭的時代》（台北：玉山社，2012.12）。

內藤湖南著，劉克申譯，《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06）。

白永瑞著，王元周等譯，《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07）。

伊藤整編，《近代化と伝統》（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七卷）（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59.11）。

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63.08）。

李永熾，《日本近代思想論文集》（新北：稻鄉出版社，1998.05）。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一朝鮮王朝末期の国母一》（日本東京：新潮社，1993.07）。

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校注，加藤周一等編，《學問と知識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十冊）（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8.06）。

金文學著，馬今善、鄭炳男譯，《重新發現近代：一百年前的中日韓》第一部（中國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01）。

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02）。

馬歌東，《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01）。

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08）。

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06）。

莊怡文，《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新北：稻鄉

出版社，2018.03）。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93-94。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06）。

溝口雄三著，李甦平等譯，《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09）。

福沢諭吉著，山田聰編，《福沢諭吉 朝鮮・中国・台湾論集：「国権拡張」「脱亞」の果て》（日本東京：明石書店，2010.10）。

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03）。

關口泰著，關口隆克編，《空のなごり：默山關口泰遺歌文集》（日本東京：刀江書院，1960）。

關口隆正，《砲槍餘響》（日本東京：福島棟三郎發行，1895.04）。

———，《台灣歷史歌》（日本東京：村田直景發行，1900.04）。

———，《朝鮮歷史歌》（日本大阪：石塚猪南藏發行，1904.04）。

———，《夢界遺文》卷一（日本東京：關口泰發行，1929.06）。

鶴見俊輔，《現代日本思想史》（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91.05）。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子安宣邦著，林鍵麟譯，〈近代日本對抗軸——亞細亞主義：日本近代史與戰爭的二重性〉，《文化研究》6期增刊（2008.09），頁45-57。

莊怡文，〈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5號（2011.06），頁315-342。

（二）學位論文

莊怡文，〈近現代閩台關係下的林本源家族古典文學及其相關活動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07）。

三、電子媒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資料庫（來源：<http://>

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檢索日期：2018.06.20）。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大鐸版、漢珍版）、《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來源：<https://hslib.sinica.edu.tw/?q=cht/node/4566>，檢索日期：2018.06.20）。

